

● 教育学

何谓大学之“大”

——关于我国大学之“大”的回顾与反思

程 斯 辉

(武汉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程斯辉(1962-), 男, 湖南南县人,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发展史和教育管理学研究。

[摘 要] 大学之“大”涉及到大学是什么、做什么等大学发展的根本问题, 涉及到大学教育的本质及其规定性, 涉及到大学的定位与特色的形成。在我国的大学发展历程中, 先辈对大学之“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形成了许多独特见解, 这对指导当前大学的建设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启迪、参考价值。当代大学只有从关注大学的有形之大、有限之大, 即重视大学的时空之大、大楼之大、规模之大转向关注大学的无形之大、无限之大, 即重视大学的胸怀之大、文化之大、精神之大, 才能使大学真正肩负起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大任。

[关键词] 大学; 大学观; 大学内涵; 大学定位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1-0099-08

大学之“大”, 既是一个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既是一个历史问题, 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从理论上讲, 大学之“大”涉及到大学教育的本质、内涵。从实践上讲, 大学之“大”涉及到办学者的办学思想、学校办学目标、管理方略的确定和学校的定位与特色的形成。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 大学之“大”是不断推进的, 不同时代的大学有其“大”的不同内含, 但也有其“大”的共同特点, 这种特点往往体现或反映着大学教育的历史发展规律。从现实状况看, 大学规模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 “大学所发生的变化或许不都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大学精神的衰微成为世界性的话题”^[1](第 3 页)。因此, 对大学之“大”进行回顾与反思就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大学之“大”之回顾

一般认为, 我国具有现代意义之大学的产生是以 1893 年创办的武昌“自强学堂”和以 1898 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为标志, 在此后的大学教育发展历程中, 有许多教育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其心目中的“大学”、大学教育进行了思考、探索与实践, 留下了值得深思和品味的精神食粮。

(一)“凡大学皆专门之学, 实验之学”

这是近代著名的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对大学的根本看法。康有为非常重视教育, 曾亲自举办过“万本草堂”, “教旨专在激励气节, 发扬精神, 广求智慧”^[2](第 237 页), 在“百日维新”期间, 他与梁启超更是直接奏请光绪帝, 促成了京师大学堂的设立。康有为理想的大学, 是他在 1902 年著的《大同书》中所描绘的大学图景。在《大同书》里, 康有为提出了建立一个普及的、平等的、完备的教育制度, 儿童未出生时要受胎教, 出生之后依次进育婴院、小学院、中学院和大学院接受教育。他认为: 小学院教养儿童的重

点是要根据儿童身心特点专以养体为主,开智次之,宜令功课稍少而游戏较多;中学院的教育重点是“除养体开智以外,又以育德为重”^[3](第116页);大学院则主要对16岁到20岁的青少年进行专门教育。康有为认为:“凡人自十六岁离中学而入此,至二十岁而出学,生人之学于是终焉。凡大学皆专门之学,实验之学。”在大学里,教育的重点是“于育德强体之后,专以开智为主,人人各从其志,各认专门之学以就专科之师”^[3](第118页)。在康有为的心目中,大学教育是在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的基础之上对学子所进行的专门教育、专业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掌握专业知识与专门技艺,形成从事专业工作的能力,最终能够就业以自养,就业以创业。因此,他特别强调大学的专业教育与实际相结合,学生要参与实习、实验、实践,“学农必从事于田野,学工必从事于作场,学商必入于市肆,学矿必入于矿山,学律则讲于审判之所,学医则讲于医病之室”。有了专业教育与实际相结合,学生的专业兴趣、专业工作能力会提高,这样学生毕业时才会成才,才会有用人单位聘用,其中高才者,还能著新书、创新学、成绝学。如何保证把学生培养成有用之才呢?康有为认为慎选大学之师非常重要,他说:“大学之师,不论男女,择其专学精深奥妙实验有得者为之。”^[3](第120页)因为大学为专门之学,实验之学,大学以开智为主,故要延聘学术大师来任教。康有为关于大学教育的主张虽为其理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能实现,但其思想主张反映了大学教育的某些基本规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这是蔡元培的大学观。蔡元培作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对高等教育的主张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的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不是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不是为学生求得功名利禄、做官发财搭阶梯的。1917年1月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向学生发表演说时,对学生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其中特别强调“抱定宗旨”这一条,他指出:“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4](第152页)因此,他要求学生以求学问、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为把北京大学办成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蔡元培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学科和课程改革,强调文理兼通,并在北大设立研究所,实行选科制,激发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

蔡元培深知,要把北京大学办成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没有好的图书资料和教师是不能实现的。本着他对大学的又一理解,即“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蔡元培加强了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及其资料建设。在纪念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时,蔡元培把造一所好的图书馆、印出关于世界上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三部丛书作为今后一年重要的工作任务。同时,他花了许多心力延揽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到北大为师,在蔡元培心目中,无论何种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无论年资深浅,学历高低,只要有真才实学;无论本人政治信仰如何,都是延聘的对象。当然在“风罗众家”的思想下,蔡元培选聘教师也是有标准的:第一,选聘教师以“学诣为主”,“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4](第248页)。第二,选聘教师“要请愿意委身教育不肯兼营他事的”^[4](第276页)。第三,“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4](第337页)。在“网罗众家”的同时,蔡元培尊重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原则,对于教员所持的学派、主张,悉听其自由发展。因而使北京大学大师云集,学术研究空气日浓,学术交流交锋活跃,呈现出各家争鸣、欣欣向荣的景象。

由此可见,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成功改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大学的理解,他的大学观指导了他在北京大学的实践,没有这种大学观的指导或用其它什么大学观作指导,北京大学不会有“五·四”时期的辉煌,也不会有后来的北大精神与北大传统。由此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大学观,便会有什么样的大学。

(三)“所谓大学者,养成可以为官之国民,不必尽为官也”

这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对大学的理解。张謇是1894年恩科会试的状元,他高中状元后面临着为官、做事的人生道路选择,审时度势之后,他作出了愿成有用之事、不做庸碌之官的决定,从北京回到老家南通,开始兴办实业。后用兴办实业的盈利大力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

对于大学教育的举办，张謇认为不能沿袭中国旧传统，要端正办学目的，过去学子热衷上大学是以为大学与政界相近，把大学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不仅认为读书要做官，而且以为读大学一定要做官。对此，张謇指出：“鄙意所谓政界之人者官也，所谓大学者，养成可以为官之国民，不必尽为官也。”^[5]（第68页）在张謇的心目中，办大学不能只为政界培养人才，还要为政界以外的实业界、商界、教育界培养人才。张謇对大学的理解与蔡元培反对上大学为做官是一致的，同时，张謇把办大学的目标最终转向培养国民，培养有知识的、可能为官的国民，对扭转长期积淀形成的大学培养为官者的传统有积极意义。

对于大学的看法，张謇还有一独到见解，即含有大学是大海之意。在谈到大学、中学、小学及专门学校、师范学校的关系时，他讲：“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流，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流，大学会其归。”^[5]（第211页）在张謇的心目中，整个教育事业如同一条源远流长的江河，小学是其源，中学是其流，各专门学校是由源与流派生出来的“支流”，到了大学，则如百川归海，是各种知识的总汇之处，是各种专业的总汇之处，是人类文明成果的总汇之处。这种大学，犹如大海，学生在这里能够尽情畅游，吸取营养，接受洗礼和陶冶。这种大学是大海之意，可让后人尤其是大学举办者们作无尽的遐想与沉思。

（四）“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是梅贻琦的大学观。梅贻琦曾为清华学校教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梅贻琦回国任清华大学校长，直至1948年。清华大学之为清华大学，与梅贻琦担任校长，竭诚为清华服务密不可分。而梅贻琦服务清华大学，又是由其大学观作指导的。

梅贻琦在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讲：“一所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第353页）梅贻琦突出大学教师在大学教育中的作用，是基于他对办学之目的理解，他认为：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1]（第352页），因而梅贻琦对教师的科研、学术研究非常重视。与此同时，他要求教师要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楷模，注意与学子的沟通，做引导小鱼前行的“大鱼”。梅贻琦讲：“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1]（第72页）梅贻琦办清华大学还倡导通识教育，主张培养通才，要求学子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者都有相当的了解，或者在对每门科学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能够由专而通，识其三者会通之处，而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融会贯通之境。梅贻琦是清华大学校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从1931年到1948年共17年，为清华大学的发展作出了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为后人如何举办大学教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五）“大学是社会之光”，“大学犹海上之灯塔”

这是竺可桢对大学的独特理解。自1936年4月至1949年4月底杭州解放前夕，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经历了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两个历史时期。期间，竺可桢百折不挠，殚精竭虑，使浙大在战乱和艰难困苦的环境里仍有长足的发展。

对于大学，竺可桢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他反复强调，“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6]（第838页）；“大学犹之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抗战时期）降落道德之标准也”^[6]（第840页）。在竺可桢的心中，大学是引领社会前进的灯塔，是挽救民族危机的希望之光，是引领社会道德风尚的希望之光。竺可桢希望他的学生致力学问，以身许国，学成后能为社会服务，做各界的领袖分子，社会的栋梁，把中国建设成世界第一等强国。竺可桢提出，成为领袖分子或领导人才，必须具备如下的品质：一是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二是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三是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四是健全的体格，五是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1]（第55页）。为了实现这种办学理想，竺可桢在浙大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竭力聘请德才学识兼备的教师，并尽力为教师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各方面的训练，全面夯实学生的素质基础，尤其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训练与培养，要求学生“不言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

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1](第229页)。他对大学教育的理解,他对学生提出的素质要求,是引领学生学习奋斗的航标灯,照亮着学生的人生旅程。浙江大学培养出了于子三这样为真理而献身的烈士,也培养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这样的科学家。由此可以讲,竺可桢及其确定的大学理想也是引领浙江大学在艰难困苦环境中奋斗拼搏的希望之光。

(六)什么是构成大学“大”的要素:与民众结合、自由思考、科学方法

这是雷沛鸿对大学的看法。雷沛鸿长期致力于广西的教育实践,1921年,他回国在大学任教,1940年至1941年出任广西大学校长,1944年创办西江学院并任院长至1949年。雷沛鸿对大学教育有鲜明的主张,他认为:“与民众相结合、自由思考、科学方法”^[1](第82页)是构成大学之“大”的三要素。

雷沛鸿认为,“与民众相结合”就是要改变与民众生活相背离的状况,朝着“毋忘老百姓”的目标去努力,这样,大学教育“才能有深广的社会基础,当真生根于民众生活,得民众力量的沾溉,而发荣滋长”^[1](第83页)。他进一步指出:“一个大学教育机关,不能与民众生活脱节;而且要与民众结合,有民众力量的支持,才能构成大学大的特征。”^[1](第84页)雷沛鸿认为“自由思考”“是人类能够解放于自然束缚与解放于人为束缚的开端,也是世界文明进步所必遵循的途径”^[1](第84页)。自由思考就是要打破权威的束缚,“对一切来自神道、教权、陈训的权威,都运用开明的知识,去作建设性的批判,而归根于自由思考、自由信仰,以实现世俗生活的理想。”^[1](第89页)雷沛鸿指出:“中国的大学,当真要成为名副其实之大,今后须切实培成自由思考的环境,发挥自由思考的传统。”^[1](第89页)关于“科学方法”,雷沛鸿认为是自由思考的条件,自由思考要符合科学思想、科学原理,要经得起客观事实的考验。他认为:“只有科学方法的正确运用,人类的自由思考,才能帮助人类自图解放于自然与社会的束缚。大学是民族的灵魂,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文化渊源。科学精神的涵养,科学方法的运用,科学真理的追求,乃是现代大学所以成其为大的一个要素。”^[1](第91页)雷沛鸿认定,大学教育只有与民众结合、自由思考和运用科学方法去自由思考,才能生根于民众生活,发挥其研究学术、培养人才、传播智慧、化民成俗的功能。

(七)“新大学是什么?新大学是大众的学府”

这是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所期望的大学。1917年至1923年期间,陶行知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对高等教育改革进行了深入的探索,1945年至1946年陶行知创办了重庆社会大学,提倡发展社会大学运动。陶行知所理想的大学是“新大学”,他指出:“新大学是什么?新大学是大众的学府。”^[7](第219页)这种新大学的办学之道与《大学》里提倡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有所不同。新大学“在明大德,在新大众,在止于大众之幸福”^[7](第219页)。在陶行知心目中,从前的大学是少数人的大学,不是大众的大学;新大学要成为多数人的、大众的、人民的大学。从前的大学“明明德”是要学生明儒家所提倡的人伦道德;而新大学则要大众明白“大众之德”,即要觉悟起来,联合起来,争取解放,“创造新自己,创造新中国,创造新世界”^[7](第345页)。从前的大学之亲民是教化,即便有亲近老百姓之意也具有虚伪性,并没有真正与老百姓打成一片;而新大学是要亲近老百姓,“要钻进老百姓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亲近,变成老百姓的亲人,并且要做到老百姓承认我们的确是他们的亲人”^[7](第345页)。从前的大学是要学生在明儒家之人伦道德的基础上,能够践行人伦道德,成为所谓至善之人,这是为自己谋幸福;而新大学则不同,是要为人民造幸福,“新大学的一切课程设施都要对着大众的幸福瞄准,为大众争取幸福所必需的就拿来教人,所不需的就不拿来教人”^[7](第219页)。因此,从前的大学与新大学所造就出来的人也是不同的,从前的大学造就出来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不肯为大众做事的人,这种人是“滴大众的汗,吃大众的饭,大众的事不肯干。努力摆成老爷样,不算是好汉”^[7](第219页)。第二种人“是代替大众做事,但野心勃勃,想要一手包办,甚至不许大众动手来干”^[7](第219页),这也是要反对的。新大学所要培养的不是上述两种人,“它要培养和大众共同做事的人才。如果它也免不了要培养领导人才的话,它是要培养愿意接受大众领导而又能领导大众的人才”^[7](第220页)。在陶行知的心目中,新大学是不追求高墙大院、豪华的办学,而是校舍可要,没有也王姑,纵使茅草棚也可以举办的大学。因此,创办新大学

的最好形式就是社会大学,这种社会大学可以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类都是同学,依‘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的原则”,这种无形的社会大学,“它是一个最伟大的大学,最自由的大学,最合乎穷人需要的大学”^[7](第343页)。陶行知作为人民教育家,他不是立于统治者之地位、少数人之地位,而是立于人民之地位、大众之地位来思考大学教育的,他的大学教育观涉及到了举办大学教育究竟为谁服务,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根本问题,也涉及到了举办大学教育的多种形式问题。陶行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对于我国高等教育走大众化之路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八)“大学是大学家的大学”

中国科学院院士、担任南开大学校长的母国光明确提出了“大学是大学家的大学”的理念。他指出:“学校是为学生办的,大学是大学家的大学,要让大学生有更大的选择自由。”^[8](第9页)在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上,母国光认为,因为有学生要上学,才办学校,并不是为了养教师,才办学校、招生的。因此“学校是为学生服务的”。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上,虽然应该是良师益友的关系,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生交费受教育,教师教学获得收入,“所以师生关系又是交换关系,教育者有义务为受教育者服务”^[8\](第9页)。学校如何为大学生服务,母国光认为,大学要为大学生提供一种环境:教授、教材、实验室、图书馆及其它各种获取知识的手段等等,还要为青年之间的交流、切磋和竞争提供条件,为育人成才创造必要的氛围;同时,要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志向进行专业学习的选择,给学生充分的选择自由,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引导启发学生刻苦学习钻研,使他们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全面发展。提出“大学是大学家的大学”理念,是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发展改革所滋生的诸多新问题的必然,这种大学理念反映了学校与学生关系、教师与学生关系变化的必然要求,体现着以人为本、以生为本的宗旨。信奉这种大学理念并以之指导大学教育实践,将蕴含着大学教育的巨大变化。

(九)大学是大观园

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并被英国诺丁汉大学聘为校长的杨福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办大学的思想。杨福家认为,新入学的大学生在头两年的时间里要将其放在“大观园里”,让其自我寻找,“刚刚进去的时候,最好不要把学生领到一个小胡同里面,而是应该让他在一个大观园里面自由浏览一下子,然后去逐步地看自己应该在哪些方面有所发现,有所贡献。所以教育的过程是学生自我寻找的过程”。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在复旦大学率先进行了分大类即分学院招生,学生在头两年时间里选修基础课程,两年之后根据自己所学、所思、所想再选择专业进行学习。他希望“进入复旦大学的新生不再分系和专业,而是先进入学院;主修物理学的学生最后不必都搞物理,大部分学生在毕业后可转入经济、管理、新闻、法律等领域。我们有责任让大学生在丰富多彩的环境中成长,让他们充满活力”^[9](第3页)。杨福家的这种大学是大观园的思想,实际是要对学生进行通才教育,使学生有应对知识更新要求越来越快的能力,有应对职业此消彼长之势越来越快的素质。如今在大学里尽早进行专业教育的思想被淡化,大学也是打基础,重在培养人文、科学素养的主张,也是大学是大观园之思想的一种反映。

我国现代大学教育在发展演进的百年历程中,一些杰出的大学教育家对大学之“大”的思考与实践表明:大学是重科学探索、实证、实验、学术研究和以造就人才为主的;大学是为社会各界培养专门人才的,而不只是为政界服务的;大学是以教师、学生为主体,相对独立的,而不是附属于政府、官僚机构的;大学是不断开放、扩大、与时俱进的,而不是封闭保守的;大学是关注社会现实、注重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同时又要超越现实、引力社会的。

二、大学之“大”之思考

回顾前辈们对大学之“大”的主张,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观点都是从某一个方面揭示了“大学”的特性,反映了大学教育的某些规律或要遵循的原则。如果用前辈们的主张观照我国当前的大学教育,在肯定我国大学教育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国当代大学教育的发展变化

并不都是欢欣鼓舞的。“我们看到,在一些地方,大学的建筑是越来越壮观,研究成果的体积也仿佛越来越庞大,可是‘斯文扫地’的事件也不绝如缕。”^[10](第26页)“也有一些大学盲目追求规模效益,造成‘欲速不达,欲大不能’的泡沫危机,并出现了盲目搞学院升级的浮躁风气。”^[11](第29页)概而言之,我国当代大学教育存在着值得深入分析与反省的问题:

其一,大学之大气魄不够。这主要反映在大学之功利化现象严重,追求短期利益现象严重,缺失融入社会而又引领社会的气魄,缺失适应社会而又保持距离的勇气和胆略。

其二,大学之教化功能退化。当前一些大学在应对世俗文化之低级文化冲击时,在应对多元文化之黄色文化冲击时是乏力的,在应对虚拟世界之不良文化冲击时是乏力的,在面对社区的不良环境包围时是退缩的。大学之对社区的教化、影响不是因学校的规模大了而越来越大,相反社区文化对大学的影响却在不断深入。

其三,大学之“育人”任务过重。在人的培养成长过程中,有基础教育与大学教育的分工,基础教育主要承担着育人的任务,大学教育主要承担着政治理想信念教育与专业教育的任务。但当代大学教育与基础教育却存在着分工倒挂现象,在大学里有不少时间用在了对大学生进行军训、进行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上,开设专门的道德修养课程对大学生进行道德品质、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做人的基本道理教育。大学教育阶段,博学的时间少了,探究的时间紧张了,专业知识学习与专业技能训练的时间不够了。时间不够的结果,带来的是质量的堪忧。

其四,大学之大师稀缺。当代大学之大师稀缺,是众所周知的,大师之稀缺与文化大革命十年之延误有关,与建国几十年来倡导自由思考、鼓励创新创造不够有关,同时,也与大学里教师过重的负担有关,与一些大学里用各种刚性措施牵引教师关注眼前、表面,应付检查、评估而不能顾及长远,不能静心、潜心有关。

其五,大学之培养目标定位不高。当代大学教育之培养的人主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专门人才,但这种专门人才在成长过程中的定位主要是为了将来谋得一份好职业,在热衷于专业技艺、技能的学习、训练和热衷于各种证书的考试获得的时候,往往对人格素养、心智的丰富以及人性品位的提升、情感的陶冶等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因而不少大学生缺失改造社会、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理想,缺失帮助他人、为民众谋幸福的抱负志向。

其六,大学之精神不足。当代大学之精神不足表现在崇尚思想自由的精神之不足,一些大学的管理者和学术权威还不能包容不同的学术观点与主张。崇尚学术神圣的传统之不足,在一些大学里学术不是神圣的,有的教师、学生把学术当游戏、当工具、当谋取功名利禄的手段。崇尚科学理性的批判精神之不足,一些大学讲究学派传承,一些教师热衷于师法家法,不能或不允许有批评的声音,哪怕是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崇尚真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精神之不足,大学是真理所在,大学之主体当以真理、是非为处事前提,坚持真理,便能独立不惧,便能不计利害,然一些大学在官、学、商之间,在遵照政府或官员指示、在坚持教育教学规律、在面对经济利益之间,“钟摆”经常摇摆着。

其七,大学之理念不明。大学理念是大学主体对大学或大学教育的根本看法或根本观念,是大学主体之大学观。大学理念或大学观是大学教育实践与行动的指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大学的特色。在我国当代,除了一些举办时间较长、历史悠久的少数大学有其大学之传统影响而形成了“名牌”或特色外,众多的大学没有自己鲜明的大学理念或大学观指导,因而,也就特色不鲜明,比较优势不突出。

我国当代大学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之解决,需要综合考虑,包括大学教育制度的改革,包括管理制度的改革,甚至还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等,而在观念或理念层面,弄清楚大学之“大”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但要给予大学之“大”确切的令人满意的回答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从上面所介绍的关于大学之“大”的众多理解中不难看出。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同的人,尤其是从事大学教育或接受大学教育的或与大学教育有关系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大学之“大”,将这种对大学之“大”的理解付诸实践,偶合形成大学的鲜明特色。但个体的大学之“大”要反映大学的基本特性,不能违背大学教育发展的规

律,这就需要寻找大学之“大”的共性。能不能找到大学之“大”的共同特性呢?我以为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描述:

其一,从办大学所需的物质物理条件与文化精神条件来看,大学之“大”应包含以下六种特性:

一是大学要有时空之“大”。所谓时空之“大”,是指办大学要为学生提供必备的活动空间,大学生受教育空间不以学校范围为限,同时学生学习的时间不要给予限制,要由学习时间固定制转向学习时间的弹性制。

二是大学要有“大楼”之大。所谓大楼之“大”是指办大学要有充足的教学、实习、实验、实践的物质条件,尤其是要有高新的仪器设备,以供教学、学术研究之用。

三是大学要有规模之“大”。所谓大学要有规模之“大”,是指大学要有一定的学生规模,小规模办学存在着资源的浪费,只有规模适中才能做到资源的充分利用,提高办学效益。当然,大学的规模之“大”是有限制的,不是没有限制的“大”。

四是大学要有胸怀之“大”。所谓胸怀之“大”,有两层含义:一是大学的办学者如校长、管理者要有大海一样的胸襟,要有大家风范,能网罗不同类型的人才,容纳不同的学派与学术观点,并尊重、信任他们,允许他们自由思考。二是大学的教育者教师要有博大的胸怀,能包容不同的学术观点,包容同行的不足与缺陷,而不文人相轻,能包容不同个性的学生,包容并欣赏学生的创新观点。

五是大学要有文化之“大”。所谓文化之“大”,内含之一是指大学要能包存各种不同的文化,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无论是高雅文化还是世俗文化,无论是民族文化还是世界文化,无论是古代文化还是现代文化等等,大学应是各种文化总汇之处。内含之二是指大学要创造和形成自己的文化传统,形成自己独特的校风、学风、教风,形成一种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育人氛围。

六是大学要有精神之“大”。所谓精神之“大”,就是前辈所倡导的独立自由精神,科学理性精神,探索创新精神,牺牲奉献精神。大学有了这种精神,才会真正成为社会的良心所在,才会真正成为社会的理想所在,才会真正赢得其神圣的地位,才会真正成为社会之光。

上述各个方面的“大”,时空之大,大楼之大,规模之大是有限的,而胸怀之大,文化之大,精神之大是无限的大。办大学者在充分保证有限之大时,应着力在无限之大上下功夫,只有不断地扩充大学之无限之大,大学才会产生无穷的力量,推动人的发展,推动科学、文化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

其二,从举办大学的基本要素来看,大学之“大”可以作如下理解:

一是大学培养目标要“大”。大学不能把培养人才简单定位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专业技能的训练、培养能就业的人才上,要把培养能够改造社会行大道、践大义、履大节、堪大受的“大丈夫”作为培养目标,这种人不仅能够自存、自省、自律、自强,而且还能影响他人、帮助他人、教化民众、改造社会,他们是社会的栋梁,民族的栋梁。

二是大学之师要“大”。大学教师应是明师、大师,是学术上有精深造诣、富有创造性的人,在教书育人上是接近或达到“圣化”之境、让学生如沐春风的人,在道德品行上是人格高尚足以为模范的人。

三是大学之教育内容要“大”。大学教育内容之“大”是指大学所学习的内容是博大精深的,大学生能够广博地学习,在广博学习的基础上去探究更深奥的道理与规律,了解和把握关于自然的、社会的、人生的大道理,即学习前人所谓的大道、大德、大义、大典。

四是大学培养的学生要有大境界、大气魄。在大目标的导引下,通过大师传播和探究“大道理”,使学生具有大雅、大度、大方的气概与品质,能够识大体、有大观、有大智,能把握大势,创造大业。具体而言,通过大学教育,要使学生进一步脱俗,变得文雅;要使学生摆脱私利私欲的束缚,不吝啬、不拘束、不俗气,变得宽宏大量,要使学生心思真善美,憎恨假丑恶,目光远大,能够把握自然变化的规律,把握社会变化的规律,把握人生变化的规律,不被暂时的、一己的、功利的东西所蒙蔽、诱惑、困惑,成为一个具有高境界、高品味、高素质、高本领的人。

[参 考 文 献]

- [1] 杨东平. 大学精神 [M] .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0.
- [2]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 1 辑(下)[M]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 [3] 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文选[M] .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
- [4] 高平叔. 蔡元培教育论集 [M] .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
- [5] 张謇研究中心, 南通市图书馆. 张謇全集·卷四·事业[M] .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 [6] 竺可桢. 竺可桢日记: 第 2 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7]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陶行知教育文选[M] .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
- [8] 母国光. 我对大学教育的理解 [J] . 高等教育研究, 2002 (4) .
- [9] 光明日报教育部. 中国大学校长访谈录[M]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8.
- [10] 南风窗编辑部. 大学之道 [J] . 南风窗, 2002, (4) .
- [11] 张立勤. 大学应是理想化的所在 [J] . 南风窗, 2002, (4) .

(责任编辑 涂文迁)

What Is the “Greatness” of University

CHENG Si-hui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CHENG Si-hui (1962-),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management.

Abstract: The “greatness” of university concerns the essential issues of university development about what is university and what does the university do and so on, also concerns the essence and regulation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concerns the orientation and form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iversity. During the development course after our universities came in to being, our predecessors had pondered the “greatness” of university and formed many particular views, which have highly enlightened and given valuable reference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Our present universities none but switch from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bigness of materiality and finity of university, Viz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bigness of space time, multi-storied building and scale to concerning the greatness of bosom, culture and spirit of university, which could really make the university take on the great responsibility of accelerating grandeur renaissance of our nation and promoting the advancement in civilization of human society.

Key words: University; Views about university; connotation of university; orientation of university